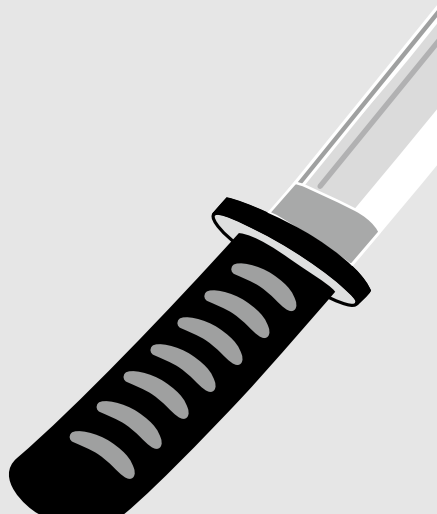


國家的歧途：

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1912—1945）





國家的歧途

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
(1912-1945)

馬國川 著

中品用線
OPEN SPACE
中

序

讀日本，問國運

—— 馬老師，您現在在寫哪些方面的書？

—— 1912–1945 年的日本。

—— 哇塞，這段歷史太沉重了！

—— 是的，越寫越沉重。

這是 2019 年 5 月中旬我和日本朋友小針健一的微信交流。小針是一個 20 多歲的年輕人，幼時隨父母由中國東北移民日本。他是「明治維新探訪之旅」的導遊，中日雙語俱佳，獲得了旅遊團友的好評。

這次文化旅遊是湘財證券創始人陳學榮先生組織的。從 4 月底到 5 月上旬，我們一行 10 多人（著名歷史作家唐浩明老師夫婦也參加了）在東瀛大地上行走。從鹿兒島到長州，從京都到東京，我

們追尋明治維新的史跡，探索一個後發國家崛起的秘密。此行的中間點，是位於關門海峽邊上的下關（又名馬關），也就是 124 年前李鴻章簽署《馬關條約》的所在地。當我參觀「日清講和紀念館」時，歷史風雲都來眼底，太多感慨湧上心頭，遂口占一首打油詩——

兩百年來世事艱，傷心最是近馬關。

三千里外問國運，青史莫作等閒看。

是的，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近代以來的國運卻如此不同，難道不值得認真思考嗎？

—

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輩看過《國家的啟蒙》書稿後說，這本書好像沒有寫完，應該寫到日本戰敗。確實，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從 1853 年黑船來航、日本打開國門，到 1945 年日本徹底戰敗、無條件投降，是日本第一輪現代化進程^①的完整過程：開國—追趕—崛起—歧路—毀滅。這是一個以成功始、以失敗終的故事。《國家的啟蒙》雖然多處指出，明治晚期的日本已經出現了歧途，畢竟沒有將故事講完。

① 筆者將 1853-1945 年視為日本的第一輪現代化，從 1945 年戰敗開始的全面改革是日本的第二輪現代化。

在前輩的鼓勵下，我開始追尋明治天皇去世後的日本發展軌跡。就像我和小針健一在微信交流裡說的那樣，這是一段「越寫越沉重」的歷史。如果說，明治維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響曲，那麼從 1912 年開始的日本歷史則是從充滿希望的歡快節奏開始的，後來越來越混亂低迷，至 1945 年曲終之際，已經絕望哀痛，不忍聽聞。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大正時期的日本充滿了向上的希望：國內建設蒸蒸日上，1910 年–1920 年經濟增長 60%，民主運動不斷發展，政黨制度、議會制度迅速成長；國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躋身「國聯」四大常任理事國之列，主張人種平等和協調外交，贏得國際社會的讚譽。但是，就在國內發展、國際和平的背後，暗潮湧動，崢嶸時現。1929 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給日本巨大的打擊，右翼勢力開始膨脹，1931 年製造「九一八事變」，此後日本就像一條巨輪突然掉頭，逆流而行。

從這時起的十年時間裡，日本所有的舉措看起來好像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贊同、甚至歡呼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舉措中走向了戰爭深淵。雖然有個別清醒者沒有被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潮流衝昏頭腦，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識精英都成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吹鼓手，推波助瀾。許多人（特別是青年軍人）確實不願意假裝看不見社會的不公，不願意假裝聽不見民眾的哭聲，可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卻將國家推進災難的泥潭。這不是更大的悲劇嗎？！

1941 年日本和美國 GDP 總量比例為 1:26，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力比例為 1:77.9。國力如此懸殊，為甚麼日本愚蠢到要與美國開戰？其結果不但讓世界遭受塗炭，也讓自明治維新以來幾代日本人奮鬥得來的現代化成果毀於一旦。這種瘋狂的「民族切腹」行為是怎麼發生的？我認為，這是 20 世紀世界史上的一大謎團。

更大的悲劇在於，從 1931 年到 1945 年，在長達 15 年時間裡，日本的最大戰場是在中國，為日本的瘋狂行為付出最大代價的也是中國。本來，中國局勢從 1920 年代中期開始平靜下來，此後十年各種建設頗為可觀，但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逆轉了中國的國運。

當我寫作《國家的啟蒙》一書時，常常為中日兩國面對世界衝擊而作出的不同選擇而感慨。當我寫作這本《國家的歧途》的時候，更多的是悲憤。「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須臾誤」。國運如此，夫復何言？有時繞室而走，心意難平。

二

1915 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爾斯坦·凡勃倫訪問日本。

這位以《有閒階級論》一書而聞名的大學者對這個新興國家頗有好感，他說自己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間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在他看來，科學和工業的推廣導致了相似

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現，尤其是在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因此他預言，當日本變得更加現代時，日本人將丟棄「舊日本的精神」，擁抱遍及世界先進國家的「理想、道德、價值和原則」。反過來，相近價值觀的建立也會支持與歐洲和北美相似的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制度。

一開始好像果真如此。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大正時期的日本積極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是很快，凡勃倫的預言就完全落空，因為狂熱的民族主義越來越控制了這個國家。毋庸諱言，對於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新興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是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但是一旦失去節制，那麼民族主義就會反噬新興國家。恰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說：「沒有比狹隘的民族主義更有害的東西了。」

在大正時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會多元化，但是進入 20 世紀 30 年代，這個國家的氣質發生了變化。彼時的日本人對國家馴服，認為滿足國家的需要是天經地義的，將國家利益置於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愛國的表現。強調忠誠於國家和毫不猶豫地為國捐軀，釀成一種盲目的民族主義。

盲目的民族主義可以蒙蔽國民的心靈，也可以蒙蔽國家的雙眼。特別是在遭受世界經濟危機之後，日本沒有審視自己的問題，而是從外面的世界裡尋找敵人。它也如願以償地找到了：西方。日本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日本應該從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壓制下解放出來，這種輿論成為主流。在明治維新時代被推崇的現代文明價值觀和秩序，而今被輕蔑地貼上「西方」、「資本主義」、

「物質主義」等標籤。

盲目的民族主義讓日本拒絕承認普世的價值觀。它自暴自棄地退出「國聯」之後，就成為文明世界的棄兒。日本不但沒有反思，反而進一步鼓吹自己的特色，宣揚自己文化獨特、制度優越，號稱要「近代之超克」（克服現代性）、「超越西方」，彷彿全世界都應該學習日本。於是，政黨政治、議會制度等現代文明被踐踏，天皇制度被吹捧為世界最好政治體制，膽敢懷疑者就會被斥責為「非國民」（日奸），遭受打壓。

法西斯主義思想家北一輝說，一旦將那些外國雜質清除乾淨後，一個復興的日本就注定在民族國家交戰的災難中取勝，將會創建一個「偉大的革命帝國」。他的預言一部分是對的，因為，盲目的民族主義和狂熱的愛國主義的合流，必然導致軍國主義。可是，軍國主義沒有讓日本「取勝」，反而將日本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通過明治維新，日本成為世界強國，給其他後發國家以巨大的鼓勵。可是最終它卻自取滅亡，這難道是後發國家追趕現代化的宿命嗎？當然不是。深入歷史現場觀察就會發現，即使是在歷史轉折點上，也並非只有一條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種選擇。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戰爭的餘地。縱觀日本現代化的過程，這個國家似乎每向前邁進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兩步才行，結果以失敗國家告終。現代化是一個充滿荊棘的道路，只有戒躁戒懼，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為後發國家，尤其

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義所左右。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啟示吧。

三

2016 年 11 月 9 日中午，我在東京日本橋附近的一家中餐館邊吃飯，邊緊張地觀看電視。當特朗普最終以 306：232 的選舉人票數擊敗希拉里、當選第 57 屆美國總統的結果公佈後，我悵然若失。雖然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就已經進入多事之秋，但是我預感到，未來的不確定性陡然增大，世界會更加無序。儘管有心理準備，但是過去三年時間裡，中國和世界變化之快之大，仍然出乎意料。

全球化遭遇挫折，民族主義湧動，民粹主義上升，威權主義和強人政治回潮，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戰爭危險冒頭，甚至有「注定一戰」^①的輿論公然出現。世界越來越令人不安，也讓有識之士對於未來表示擔憂。在這樣的背景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何以自處，如何面對世界？是繼續以改革開放的姿態融入世界，還是召喚民族主義，探索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道路？這些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重大問題。

如果說明治時期的中日兩國可以對照而讀，那麼明治之後，它們

①〔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 月出版），不過作者並沒有預言注定會發生戰爭。

就像兩條不同道路上奔跑的馬車，漸行漸遠，已經無法比較。因為日本是初步實現現代化（儘管很不完善）後如何融入世界的問題，而中國是如何實現國家獨立、追趕現代化的問題。不過，對於我來說，1912-1945 年的日本歷史對於今天的中國似乎更有意義。因為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山重水複，一百多年以來穿越無數驚濤駭浪，中國這艘巨輪第一次逼近了「歷史三峽」的出口。但是，如何防止和克服狂熱的民族主義，融入世界文明，完成向現代國家轉型，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全球化時代，如果失去世界視野和歷史眼光，囿於本國，難免重蹈失敗國家的覆轍。縱觀世界近代史，失敗國家不是少數，而且有些國家還會在相同的地方栽跟頭。因此，對於一個處於上升時期的新興國家而言，更有必要以開放的心態，深入學習各國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從中汲取智慧，避免歧途。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歷史延長線上，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還沒有完成。國運可長亦可消，端看是否能夠學習和反思。

在我看來，比起歐美國家來，中國最應該學習和借鑒的是日本。可是，新世紀以來，特別是 2008 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中國國力不斷增強，歐美發達國家卻籠罩在衰退的陰影裡。於是，驕傲情緒驟起，歐美遭到輕視，遑論「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對於這個一衣帶水的近鄰，不管是其現實還是歷史，我們都知之甚少。現在中國正處於發展的關鍵時期，是補上這一課的時候了！

每當我閱讀日本之時，有句話總時時迴蕩在耳邊：日本是中國的鏡子，也是中國的鞭子。以日本為鏡子，中國可以知道自己的進退得失；以日本為鞭子，中國可以讓自己保持警醒。

是為序。

馬國川

2019年11月12日於北京

目 錄

序：讀日本，問國運	i
-----------	---

第一編 改造

德富蘆花：時代的憤怒與未來的憂慮	002
日本之春：第一次護憲運動	010
澤柳事件：教授對大學校長說「不」	019
阿部守太郎暗殺事件：日本的自制力漸將消退	025
從松方正義到孫中山：對日中關係的憂思	032
白虹貫日事件：日本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039
平民首相原敬：「不讓這種潮流發展過快」	045
吉野作造：大正民主的旗手	053

牧野伸顯：預見世界形勢的外交家	066
日美戰爭不可取：一個海軍將領的警世之言	074
朝日平吾：想給國家治病的「病人」	080
北一輝：極左極右一紙隔	086
德富蘇峰：日本帝國的「戈培爾」	103
治安維持法：製造 20 年白色恐怖的惡法	113

第二編 轉向

「非國民」石橋湛山：大日本主義，還是小日本主義？	122
濱口雄幸：死於憲法黑洞的首相	134
室伏高信：侵華高潮中的反對者	141
與謝野晶子：從反戰詩人到戰爭歌頌者	147
井上日召：暗殺是菩薩行為	153
新渡戶稻造：「否定日本的慣犯」	159

犬養毅：「他必須成為國家改革祭壇上的供物」	166
菊竹六鼓：要憲政，還是要法西斯？	176
松岡洋右：讓日本成為「國際孤兒」的「國民英雄」	186
瀧川事件：大學與國家權力的最後較量	198
轉向：在權力面前彎曲的脊梁	208
豪斯上校的忠告：日本不要重蹈德國覆轍	216
美濃部達吉：學術問題政治化的犧牲品	222
河合榮治郎：戰鬥的自由主義者	236

第三編 絕路

住嘴事件：日本議會政治的潰敗	244
齋藤隆夫：吾言即是萬人聲	253
「不要錯過這班車」	260
桐生悠悠：我要離開這個畜生當道的世界	268

山本五十六：把國家命運押在賭桌上的「英雄」	275
及川古志郎：日本海軍為甚麼沒有阻止戰爭？	281
日本為甚麼會選擇「民族切腹」？	290
東條英機：牢牢抓住多數灰色群體	298
立此存照：和軍國主義同流合污的知識分子們	306
佐佐木八郎：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神風特攻隊員	318
一個紀念碑的故事：日本人為甚麼仇恨美國？	325
吉田茂：從「謀反分子」到「愛國者」	333
後記：站在思想和時間一邊	340
近代日本大事記（1912—1945）	345
參考書目	356

第一編 改造

德富蘆花： 時代的憤怒與未來的憂慮

明治天皇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德富蘆花正在東京郊區隱居。這位生於明治天皇即位之年的著名作家回顧正在遠去的歷史，感慨地寫道——

陛下駕崩掩合了明治之卷。明治成為大正，余感到像吾生涯已中斷。感到明治天皇帶着我的半生而去。哀傷之日，田園對面的糖果鋪中一聲長長的笛聲宛如吹進了我的心田。

這詩化的文字表達了從明治維新時代走來的一代人的心聲。對於

德富蘆花來說，他的心情遠比一般人更為複雜。因為剛過去的時代給他帶來了傷痛和悲憤，即將到來的時代則讓他感到茫然和憂慮。

—

1868年，德富蘆花出生於熊本縣的武士家庭，兄長就是被譽為福澤諭吉之後最著名思想家的德富蘇峰。少年時代，兄弟兩人都受到自由民權運動的影響。和很早就投入自由民權運動、並因此成名的哥哥不同，年輕六歲的蘆花喜愛文學，很長時間在哥哥主辦的「民友社」擔任校對工作，同時從事西洋文學翻譯，撰寫一些雜文小品。蘆花跟着哥哥走上社會，也受到他的很大影響。不過，兄長在世人面前的出色表現，一直讓蘆花感到自卑而苦惱。

直到而立之年，德富蘆花因長篇小說《不如歸》而一舉成名。故事的政治背景是甲午戰爭前後，揭露了明治時代婦女不安、脆弱的社會地位，控訴了封建家長制的罪惡。這部小說一紙風行，九年內發行一百版，成為明治時期最受歡迎的大眾小說之一，確立了德富蘆花在日本文壇的獨特地位。這部作品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廣泛流傳於全世界，成了世界文學史上的傑作之一。

也就是從這時起，兄弟兩人的思想開始發生分歧。特別是甲午戰爭中，德富蘇峰極速地從自由民權的擁護者轉向國家主義者。他極力主張對中國開戰，聲稱「舉國一致對付清國是當務之急，為此我願意犧牲我所有的一切」。他還提出各種理由，為政府發動的戰爭辯護。而德富蘆花仍然深信自由民權，因此不能認同哥哥的思想轉向。

後來，德富蘇峰越來越向政府方面靠攏，還出任政府的敕任官員，所辦雜誌也成為「御用報紙」。而德富蘆花堅持把筆觸指向現實，批判社會。1903年他發表長篇小說《黑潮》，揭露政府的專橫暴虐，批判封

建道德，宣揚人道主義思想，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因為思想上的鴻溝，兄弟兩人終於分道揚鑣，斷絕來往。德富蘆花在給「蘇峰家兄」的信中寫道——

處於思想界者以不屈為骨氣。我在文學上自倡文學之獨立，不得不通過美而彷徨於真善之境。在經世的手段上，你着重於國力的膨脹、主張帝國主義。我吸取雨果、托爾斯泰、左拉等人的思想而主張人道之大義、主張自家的社會主義。

1905 年日俄戰爭爆發之後，德富蘇峰為戰爭歡呼，宣揚「力的福音」。他提出「國家第一，辦報第二」的方針，徹底墮落成政府的喉舌。而德富蘆花則站在和平主義的立場上，堅決反對戰爭。他在《勝利的悲哀》一文中指出「敗北是悲哀，勝利亦是悲哀」，批評日本對俄國的勝利是空洞的、充滿「憂鬱」的勝利。他說，國家富強不是靠十幾個師團和幾十萬噸戰艦結盟便可維持的。

當時日本精英和民眾普遍認為，日俄戰爭標誌着日本從此躋身世界強國，明治維新的「強國夢」自此實現。可是在德富蘆花看來，日本「加入列強行列」，是依靠軍隊、與其他大國結盟以及掠奪殖民地達到的，對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卻幾乎沒有甚麼意義。而且，日本的勝利已經引起了其他國家的恐慌，它們勢必會通過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來應對這一新的動向，種族對抗的危險也不容忽視。德富蘆花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結束日本對軍事力量的依賴，將其改造成致力於「和平與公正」的國家。

不能不說，德富蘆花的觀點是頗有遠見的。對日本來說，除了滿足虛幻的「強國」的虛榮感，這種「大國崛起」模式並非福音。儘管獲得國際社會認可，成為一個毋庸置疑的強國，日本卻感到孤立無援，缺乏安

全、失去方向的負面情緒也在增強。就像伊藤博文在 1907 年所說，日本從未像現在這樣在世界上孤立無援。歐美國家對日本充滿戒備，亞洲國家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滿情緒也在日益高漲。既不被歐美國家接受，又在亞洲遭到反對，日本應向何處去？

德富蘆花提出的「和平與公正」的國家，無疑是一條正確道路，可惜日本沉浸在「強國」的迷夢裡，很少有人接受他的理想主義。他那倒向國家主義的哥哥德富蘇峰當然更不認同。德富蘇峰由於擁護政府的立場，成為貴族院議員，躋身體制高層。蘆花雖然是名滿天下的作家，卻堅持與主流和政府的立場對立，成為一個孤傲的體制外人士。誠如他在德富蘇峰為官之時，特意作的一首小詩所云：「青雲，白雲，皆為雲。然我是白雲，聽憑心之所嚮，翱翔長空。」

二

1906 年，德富蘆花取道耶路撒冷來到俄國，專程拜訪他仰慕已久的托爾斯泰。到達托爾斯泰的莊園時天色已晚，莊園很大，不懂俄語的德富蘆花只好在長椅上睡了一覺。托爾斯泰非常歡迎這位遠東客人，熱情地招待他。托翁立場鮮明地反對日俄戰爭，戰爭之前他分別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引用《聖經》裡的話說「你改悔罷！」兩個熱愛和平的作家當然有許多共同語言。在七天時間裡，他們一起吃飯、游泳、散步，用英語談話，交流思想。

在托爾斯泰的啟迪和感化下，蘆花決心「做一個理想式農民」。回國後，他就攜妻遷居到東京郊外的千歲村，遠離喧囂的都市，晴耕雨讀，自稱為「美的農民」，過起了逍遙自在的田園生活。田園生活的感受和思考凝結為《蚯蚓的嚙語》，這本散文集所傳達的關於人與自然的智慧、準則和理想，可以和任何一部偉大的著作相媲美。

避居俗世的田園生活，並不意味着不再關心時事。在托爾斯泰的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的鼓勵下，德富蘆花仍然對現實社會問題保持着高度的關切，尤其是當「大逆事件」發生的時候。

1910年，一家鋸木廠工人攜帶炸彈被查出，明治政府以此為藉口鎮壓國內的民主運動。幸德秋水等24名有影響的進步人士被逮捕，並被控「謀殺天皇罪」，判處死刑。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大逆事件」。德富蘆花對死刑判決提出強烈抗議，兩次上書，並在《朝日新聞》上發表文章，呼籲天皇減刑。

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明治政府被迫讓步，12人免死，但是其餘仍被絞首，包括幸德秋水。白色恐怖之下，文壇噤若寒蟬，作家們或沉默無語，或暗中諷刺。唯有德富蘆花拍案而起，事件一週後就在東京「一高」（第一高等學校）發表演講《謀叛論》，強調指出思想自由的重要性，猛烈攻擊政府「用判處死刑來威嚇國民」，「一面赦免12名來討好，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將其餘12名執行死刑——不！這不是死刑，是暗殺！」

在國家權力恣意橫行，知識分子們明哲保身、袖手旁觀之際，蘆花卻公開地大聲疾呼：「諸君！幸德君等被當局視為謀叛者殺害了。但是，不要怕謀叛；不要怕謀叛者，不要怕自己成為謀叛者！新事物都是謀叛的。『不要怕殺得了身殺不了靈魂的人！』肉體的死亡無所謂，可怕的是靈魂的死亡。」

這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對日本知識分子的一次嚴峻考驗。德富蘆花的仗義執言令他們震驚，同時也讓他們自感慚愧。著名作家永井荷風後來說，「面對這一事件，自己沒有發言，對一個文學家來說，是良心上難以忍受的痛苦。我為自己是個文學家甚感羞恥。」（不過，在日本侵華前夜，永井荷風不僅毅然辭去帝國藝術院會員的頭銜表示消極的抗議，而且指出日本當局「無異於將現代日本帶回到歐洲中世

紀的黑暗年代」)。在嚴酷的政治高壓下，世人噤口，甚至不敢公開提到「秋水」之名，唯有德富蘆花大無畏地把新造的屋子命名為「秋水書院」。

直到今天，在群馬縣的「德富蘆花紀念文學館」裡，還珍藏着德富蘆花當年的演說辭和為秋水等人辯護寫給天皇的公開信原件。後人瞻仰前賢手跡，仍能感受到德富蘆花磅礴無畏的勇氣。

三

明治天皇的去世，有些人感到悲傷和失落，有的人則滿懷從國家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的輕鬆感。富國強兵、立憲制度、日俄戰爭勝利、修正不平等條約，早先都曾經給日本的發展注入過活力，但是隨着目標的完成，它們已經不再具有足夠的凝聚力。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日本向何處去？各種新思潮由此蓬勃湧動。在繁雜紛亂的社會思潮中，德富蘆花堅持自己的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立場。

1919年，蘆花攜愛人周遊世界。彼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第二年，作為戰勝國，日本國內的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思潮再次高漲。在國內勢力的鼓動下，參加巴黎和會的日本代表要求接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借地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島嶼，以確立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優勢。

在法國，德富蘆花向出席巴黎和會的日本首席全權代表西園寺公望、美國總統威爾遜等人提出七條意見：（一）改「講和會議」為增進人類幸福的「世界家族會議」；（二）制定世界共通的新紀元，以今年為第一年；（三）人類不再互相殘殺，無條件廢止海陸空軍；（四）廢除關稅；（五）制定國際貨幣；（六）土地還原；（七）取消賠償與負債。

這七條體現了德富蘆花反對暴力、四海一家的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思想，在當時被譏笑為「迂腐之見」，沒有獲得認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批評德富蘆花的觀點是「錯誤觀點」。嗚呼，難道否定暴力、熱

愛和平，不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嗎？何錯之有！假如多一些蘆花，少一些所謂的「識時務者」，這個世界肯定會避免許多戰爭悲劇。

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團極力爭取與西方列強平等的地位。它針對當時流行的「白人至上主義」提出，在新建立的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盟約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大多數與會國，包括中國代表在內，都投票贊成。可是，由於澳大利亞的堅決反對，「種族平等條款」沒有通過。此事讓日本對西方列強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埋下了後來歷史的宿因。

尤其是1924年，美國通過針對日本的移民修正法案，幾乎完全禁止亞洲人入境和取得美國市民權。消息一出，日本舉國嘩然。民眾集會遊行，反對排日法案。眾多知名學者發表強硬宣言，督促美國反省。德富蘆花斥責這種族歧視是非人道的，強烈要求美國反省。和擁護擴大日本帝國的主流觀點不同的是，德富蘆花堅持以和平主義者自任，努力排除太平洋紛爭。遺憾的是，他的力量非常單薄，無力阻擋日本社會對歐美國家的疑慮和排斥。對於日本將來是否能夠與歐美國家和平相處，蘆花深感憂慮。

就在美國通過排日法案的前一年，1923年12月26日，無政府主義青年難波大助用鳥槍刺殺皇太子昭仁未遂，被捕繫獄。按照刑法，無論遂與未遂，謀殺皇室成員都是死刑。但是日本輿論一直對外界宣稱「沒有一個日本人會反抗皇室」，所以大審院（近代日本的最高法院）對難波大助進行各種勸誘，讓他表示悔改，可是難波本人堅決不認罪。

在「大逆事件」中勇於為被告請命的德富蘆花再度站出來。這位自稱「自家的社會主義者」的作家，為拯救難波大助而起草請願書，一方面譴責難波大助，一方面又警告說，「即使從幸德等判處死刑的結果來看，處死逆賊而不能使逆賊絕跡」，「壓制大逆，甚至正是挑動大逆的原因」。他呼籲「必須使難波大助活下來，給其改惡從善的機會」，因為只

有這樣，才能給過激思想以根本打擊。在長達一年之久的時間裡，德富蘆花竭力營救難波大助，最終無果，難波大助被處死。面對這個結果，蘆花的失望可想而知。

1927 年秋天，60 歲的德富蘆花重病。此時日本已經進入昭和時代，「大正民主」亦如煙雲遠逝。面對國內外的挑戰，日本並沒有清晰有力的解決之道。瞻望未來，蘆花心中充滿了憂慮。讓他感到安慰的是，在他臨終前，德富蘇峰趕到病榻前見他最後一面。親情終究戰勝了思想的鴻溝。蘆花握住哥哥的手，溘然長逝。

日本之春： 第一次護憲運動

我等新人已不是明治人，而是大正人，我們的舞台是大正……所謂武士道是封建遺存……於大正之新時代，提起武士道、軍人政治，我等絕不能聽之任之。

這是 1912 年 8 月初，一家報紙上發表的評論。數日前，明治天皇去世，許多國民還沉浸在悲痛之中，因為明治天皇是日本的精神象徵，他帶領這個國家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可是對一些思想活躍的人士來說，這個天皇也是壓在國民頭上的一塊巨石，雖然他被塑造為日本這個神國

與神聖家族的慈父。但在他的統治下，人們缺乏自由，社會失去活力。隨着大正天皇繼位，人們開始憧憬自由的新時代。

和心思各有不同的社會人士不同，身為首相的西園寺公望根本沒有時間考慮這些問題，而是一直在忙於宮廷事務。這位 63 歲的貴族曾經是明治天皇的父親孝明天皇的侍從，參加過倒幕運動，後來成為明治天皇的近臣，是明治維新的功勳元老。明治天皇去世後，西園寺公望一邊應付明治天皇的大喪之禮，一邊籌辦大正天皇的登基大典。當一切忙完之後，他又被陸軍增加師團的要求搞得頭昏腦脹。

兩年前日本吞併韓國，陸軍防衛範圍擴大。一年前中國又爆發辛亥革命，中日形勢迅速變化，俄國在中國東三省的軍力也有膨脹之勢。於是，陸軍提出要增加兩個師團。彼時西園寺內閣正着手進行行政改革與財政改革，確定目標是削減一成支出，因此否決了陸軍增師的議案。陸軍大臣極為不滿，利用「帷幄上奏權」，直接向天皇奏上辭呈。《明治憲法》規定，軍隊的統率權直屬天皇，陸海軍軍令機關可以不經政府、直接向天皇上奏，接受裁決，俗稱「帷幄上奏」。

陸軍大臣空缺，又沒有辦法找到合適人選。因為陸、海軍大臣必須是大將或中將銜的現役軍人，而且要經過軍部推薦，可是這次軍部卻拒絕推薦新的人選。根據規定，大臣也由天皇任命，首相沒有直接任命的權力。只要有大臣空缺，內閣必須辭職。1912 年 12 月 15 日，西園寺公望內閣無奈地總辭職。這次事件被輿論稱為「軍閥毒殺內閣」。

6 天後，另一個元老桂太郎被任命為首相。這是多年以來日本政壇的慣例。原來，自 1900 年以來，西園寺公望和桂太郎輪流登台組閣。在過去的 12 年裡，兩人已經分別組閣兩次，形成了一個獨特但相對穩定的政治生態「桂園體制」。可是桂太郎的第三次組閣，卻引爆了人們心中隱藏多年的對藩閥政治的不滿。

在倒幕運動中，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簡稱「薩長土

肥」發揮了核心作用。明治維新開始，中央政府的權力主要被這四個藩國出身的人所瓜分。執政團隊因「征韓論」分裂後，薩、長出身的官僚掌握實權。例如在軍部內部，薩、長藩出身者長期保持有利地位，形成「長州的陸軍，薩摩的海軍」。歷代內閣首相也都是薩、長出身或屬其系統的官僚。他們並非黨派推舉，而是由元老秘密商討，平衡博弈，推出人選，然後天皇象徵性宣佈「大命降下」。藩閥政治家們長袖善舞，利益之爭和權力分配都在密室完成。顯然，這種「藩閥政治」根本算不上民主政治，因此受到自由民權運動的抨擊。

根據 1889 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帝國議會設置了貴族院和眾議院。貴族院議員由天皇直接任命，只有眾議院議員由選舉產生。雖然在野黨（自稱民黨）在眾議院佔據優勢，但是藩閥官僚自詡不以政黨為基礎，超然於政黨之外（稱為「超然內閣主義」），議會與內閣脫節，杯葛不斷。在野黨利用憲法賦予的預算審議權，在議會裡猛烈抨擊政府，多次削減預算。政府為了獲得預算案的通過，則採取懷柔政黨、解散議會、暴力干涉選舉、天皇詔敕等種種不光彩的手段。

1900 年，伊藤博文組織親政府的政黨「立憲政友會」，和在野黨相對抗，進而形成了「桂園體制」。在此後的 12 年裡，以桂太郎為代表的藩閥官僚同以西園寺公望為總裁的政友會互相協作，互相推薦，二人交替執政，史稱這一時期為「桂園時代」。「桂園體制」就是藩閥官僚與政黨有條件的合作體制，但政權交替的主導權及重要政策的決定權仍掌握在藩閥官僚的巨頭——元老手中。桂太郎之所以能夠三度出任首相，就是因為他得到了元老、「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的支持。

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國民所關心的都是戰爭，對於國內政治鮮有人提出異議。日俄戰爭後，以「日比谷燒打事件」為標誌，民眾開始對國內政治表示強烈不滿，民心逐漸起了變化。這個時期的選舉仍然根據財產和性別來限制資格，使得當時實際擁有選舉權的人數只佔國民

人數的 2%，民眾的真實聲音無法傳達到國會。在明治天皇去世後，人們期待刷新政治，可是軍部仍然干預政治、元老依舊操縱人事，「軍閥毒殺內閣」激發了輿論對藩閥政治的攻擊。《東京朝日新聞》譴責藩閥的「反立憲的行動」，《東京日日新聞》則高唱「大正政治維新的開始」。《萬朝報》也宣佈，要進行「維護憲法的鬥爭」，鼓勵民眾「作為國民而戰鬥」。

東京的記者、律師、政黨的有識之士等組成「憲政擁護會」。1912 年 12 月 19 日，第一次憲政大會在東京歌舞伎座召開，有兩千多人參加，聲勢浩大。大會做出的決議宣佈，「閥族的橫暴跋扈已登峰造極，憲政的危機千鈞一髮。吾人斷然拒絕妥協，以杜絕閥族政治，以期擁護憲政」。

可是 3 天後，山縣有朋的得意門生桂太郎出面組閣。藩閥系的政治家繼續操縱政權，加劇了人們的不滿，護憲運動蓬勃發展。有「憲政之神」美譽的尾崎行雄和犬養毅在全國巡迴宣傳，呼籲推翻藩閥元老政治，實行政黨內閣制。在各地的民眾集會上，最響亮的就是「打倒閥族」、「擁護憲政」等護憲運動口號。

大阪每日新聞社長在寫給一位政府高官的信中說：「其間的事情，經報紙一報道（雖與事實有些出入），國民上下便一體皆知，試作種種評論。有識之士和有志之士自不待言，而且從男女學生到市民百姓、馬伕、車伕，也在澡堂和理髮店裡傳謠，在客棧和井台議論元老會議的上述討論經過，甚至家庭婦女和女僕也在背地裡飛短流長。可見，近來罕見的政治思想的變化與普及多麼神速。而萬一報紙有教唆的言論，則火燒、砸打的事件再燃起來亦未可知，特望留意。」

在兩三週內，護憲運動擴大為以知識分子、學生為首的大規模全國性民眾運動。明治中期的自由民權運動僅限於地主、地方名士，而護憲運動參與的階層急劇擴大。實業家參與進來，政黨人士也紛紛起來

響應。面對聲勢浩大的護憲派勢力，桂太郎只得發揮自己在宮中的影響力，試圖渡過難關。

原來自從明治天皇死後，桂太郎入宮擔任內大臣兼宮廷侍從長。大正天皇自幼患有腦病，病情時好時壞，毫無主政能力，因此完全聽憑桂太郎擺佈，桂太郎因此被稱為「躲在龍袖後面的人」。在1912年12月24日召開的第30屆議會上，桂太郎曾三度下令休會，同時還以天皇的名義，向政友會總裁西園寺下達「匡救時局」的敕令。

桂太郎的行為徹底激怒了在野黨，議會裡聚集起強大的反對力量，醞釀對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桂太郎不得不親自出馬組織新黨，自任黨首，企圖渡過議會危機。本來，桂太郎是藩閥政治的受益者，也是積極擁護者，向來反對政黨政治。1910年，他在第二任首相期間，就曾嚴厲鎮壓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將幸德秋水等12人以莫須有罪名絞死，製造了著名的「大逆事件」。可是在形勢逼迫下，桂太郎也只得順應潮流，決定組黨。

1913年1月21日，新年假期結束後，帝國議會準備再次開會。為了贏得組織新黨的時間，桂太郎決定議會休會15天。3天後，第二次憲政維護大會在東京召開，這一次聲勢更大，與會者超過三千人，護憲運動的規模和影響明顯擴大。

建立新黨一事並無進展，議會復會之日在即，桂太郎決定繼續延長休會時間。他再度求助於天皇的詔敕。不久，宮中傳出大正天皇的敕語稱：「諒暗中鬥爭之局面，乃朕所不勝軫念也。」但是，詔敕已經沒有往昔的威力了。2月5日，在復會的議會上，以尾崎行雄為首的234名議員提出彈劾桂太郎的決議案，強烈批判「內閣總理大臣、公爵桂太郎本當身擔重任，卻屢煩聖敕，紊亂宮府之別，以權謀私，營結私黨」云云。尾崎行雄還發表了一篇演說，該演說成為日本國會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尾崎行雄指責桂太郎及其同夥——

天天自稱忠心耿耿，好像只有他們才真正了解何謂盡忠天皇、盡忠國家，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躲在天皇背後，向其政敵施放冷槍。他們的所作所為，難道不是僅利用天皇作護身符，或者把聖諭作子彈，藉此消滅政敵嗎？

在決議案提出的當天，議會再度被命令停會五天。處於劣勢的桂太郎多方活動，想方設法要議員撤回對內閣的不信任案。但是議員們不肯妥協，決定按照預定時間召開國會，並謀求通過對內閣的不信任案。

2月9日，第三次護憲大會召開，超過2萬人參與。第二天，也就是2月10日，護憲派議員胸前佩戴白玫瑰（表示白票，即支持內閣不信任案的贊成票），進入國會議事堂。《東京朝日新聞》記錄了當時的熱烈場面——

「白薔薇軍來了」「民黨來了」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湧向國會的群眾越來越多，警察的制止也無濟於事。中午12時20分，正門前相馬邸附近瞬時間集合了數千民眾，揮動帽子齊聲高喊「民黨萬歲」。進入議院內的國民黨議員約50名齊齊出現在議院的陽台上，揮舞白薔薇，隨門外的民眾齊喊萬歲。最後犬養木堂（毅）出現在陽台隨之附和。數千民眾忘我狂熱，騎馬隊兵分兩路，阻斷議院前的道路禁止通行。騷亂仍然不可收拾。

桂太郎本打算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但是眾議院議長勸其辭職，而且警告他說，「現在議院外騎兵與民眾發生流血衝突，爾等應負起暴亂之責任」。桂內閣走投無路，被迫總辭職，同時國會休會3日。

事態本應就此平息，可是，國會議事堂外的民眾只知道國會再次休會，卻不知道桂內閣總辭職。錯誤的信息傳遞，導致民情激憤，事態進

一步失控。一位在現場的大學生時候回憶道——

到了下午，群眾越聚越多，有數萬人從櫻田門、虎門和日比谷三個方向湧來。警視廳如臨大敵，出動了 4000 名警官來警戒。午後 1 時剛過，聽說議會再開後又休會的群眾的怒氣達到了頂點。大家一面高喊「桂出來！」一面把議事堂裡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起來。由騎馬巡查帶頭的一隊警官開來，想把群眾驅散。有人說「官憲來了！」於是，越來越激昂的群眾便說「砸御用報紙去！」隨後便殺到附近的新聞社，用火點着房舍。二匹馬拉的一台蒸汽水龍前來滅火。縱火者一個接着一個被捕，但群眾的聲勢剛一低落又高漲起來，像潮水一樣湧進了日比谷公園。

我也在其中。留在那邊的良民遭到騎馬巡查的蹂躪，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就是閥族政治的罪惡。我高喊：「我們誓死保衛憲政，葬送閥族桂太郎！」現在想起來，這是很粗糙的演說，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在最激奮時的表現。要想停止也停止不下來。像暴徒般的群眾從日比谷公園出來向銀座方向湧去，途中相繼襲擊了國民新聞社和讀賣新聞社……終於釀成了有死傷者的騷動。這時，我也被捕了。因為混在群眾中的便衣刑事警察在我的外套上用粉筆作了記號。兩名刑事警察抓住我的時候，是在國民新聞社門前。看到被押往警視廳，有點害怕了。同我一樣被捕的有 250 多人。

遭到民眾襲擊的報社有 26 家，支持桂內閣的「御用報社」悉數遭到搗毀，而站在內閣對立面的報社都安然無恙。還有 48 個派出所被火燒，其中從新橋至上野的主要街道上的派出所全被襲擊。騷亂還從東京蔓延到大阪、神戶、廣島、京都等地，許多派出所、報社遭到破壞，不少人員受傷。

有人說，各地的民眾活動「實為憲政的一大進步，不值得憂慮。」

但是，不容否認，這些活動仍帶有負面內容，有些地方甚至釀成暴亂。假如日本實施普選制和建立政黨內閣制。國民的要求能夠通過普選制和政黨內閣制直接反映出來的話，這些暴亂本來完全可以避免。

2月20日，海軍名將山本權兵衛出任首相，收拾殘局。此人屬於第二代政治家，跟元老們關係不大，也不是護憲運動直接攻擊的目標，因此被各界接受。第三次桂內閣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個被民眾推翻的內閣。持續了2個多月的護憲鬥爭最終取得勝利，各地的騷亂終於平息下去。

山本權兵衛組閣後，修改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規定陸海軍大臣不再限於現役武官，預備役、後備役、退役武官都可上位。從此，軍部失去了要挾內閣的利器，政黨力量則日漸壯大，經驗日漸豐富，並開始從與藩閥政府的提攜狀態中脫卻出來。「桂園時代」那種私下授受政權的局面被徹底打破，此後歷屆首相都改由元老推薦，經元老會議審議，再上奏天皇批准。歷屆內閣也都積極尋求與政黨的合作，甚至以政黨的「提攜」為上台的條件。這無疑加快了政黨內閣時代的到來。而第一個政黨首相就是政友會的原敬。五年後，他打破薩長藩閥政治，成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組織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內閣。

在第一次護憲運動成功、一切都恢復平靜之後，原敬在日記中寫道：「招致如此局勢的原因，無可爭論是桂定錯了方針和民心自日俄戰爭後逐漸起了變化。」至少他說的後半句話是對的。時勢變了，民心變了，人們希望建設以民主為基礎的憲政。追求民主的民眾撼動了藩閥政治，政治領袖再也無法無視國會民選議員的力量。

這種變化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評論家德富蘇峰在1914年的一篇文章裡記下這樣的觀感：「如今日本正在喪失中心點。政府無威信，軍隊無威信，就連政治家也無威信……我們既聽不到曠野中吶喊的預言家的聲音，亦看不到站立街頭，試圖指導國民的先覺者的蹤影。人們彼此

猜忌，對自己亦疑慮不安。黑暗即將來臨。」作為信奉專制統治的思想家，德富蘇峰代表了右翼對時代巨變的疑慮。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同樣是在 1914 年，某一天，民俗學家柳田國男來到新落成的大型火車站——東京站。當時正值交通高峰，他看到大批青年人從車站湧出，他們背部挺拔，腿形修長，穿着褲線清晰的下裝。而在以前，對一個武士來說，不論站姿、坐姿還是走姿，都要把力量集中在腹部，身體重心保持在下盤。即使到了明治時代，人們也習慣性地腰背下躬，因此身材顯得矮小。如今，這種武士的姿態迎來了終結的一天。日本人開始站直身軀，進入了思想空前活躍的「大正民主」時期。

澤柳事件：

教授對大學校長說「不」

「澤柳事件」的主人公是日本教育家澤柳政太郎。1888 年澤柳政太郎從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進入文部省，擔任文部大臣秘書。後來辭去官職，到教育界第一線擔任中學校長。他聰明能幹，處事果斷，多次解決校園鬧事風波，在教育界初露鋒芒。

1897 年 3 月，澤柳政太郎擔任東京市第二高中校長，解決了因前任校長醜聞事件而引起的學校騷動，使學校秩序恢復平靜，校貌煥然一新。一年後，澤柳出任東京市第一高中校長，為重整校風，他辭去 4 名教師，任人唯賢，破格提拔縣屬小學教師，在當時的教育界引起極大的

震動。「一高」、「二高」是當時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最好的高中，在這兩所學校擔任校長的經歷，使得澤柳政太郎成為教育界的明星人物。

此後，澤柳政太郎重返文部省，充分發揮其行政才能，多次得到破格榮升，先後擔任初等教務局局長、文部省副部長。他積極參與修改小學校令，提出減少教學科目、修改假名用法、限制使用漢字、制定成績考查方式、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等有益於基礎教育發展的建議。作為國家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與者，澤柳對日本現代初等教育制度的確立起到了推動作用。

1913年，澤柳政太郎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被文部省任命為京都帝國大學（後改名為京都大學）校長。京都大學建立於1897年，是繼東京大學之後，日本建立的第二所大學。當時的國立大學都由政府控制，大學校長也直接由政府任命。

和澤柳政太郎一樣，首任校長木下廣次曾任文部省局長（相對於高教局局長）。上任之初，木下校長就很明確地表明：「京都帝國大學不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分校，而是一所獨立的大學。為了學校的長期生存和發展，我們必須具有獨立的辦學特點。」因此，京都大學從建校之初就追求自己的特色。

同時，京都大學位於有着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古都。它遠離政治中心和繁華的大城市，是學者潛心治學的理想場所。獨特的學術氛圍，優美的校園環境，京都人那種「優哉游哉」的生活方式，使得京都大學逐漸形成了獨立自主的辦學傳統。

48歲澤柳政太郎抱着雄心到京都走馬上任，開始了嶄新的職業生涯。他希望在自己手裡將這所大學建成一流大學。因此就任剛兩個月，這位勇於任事的校長就要求7位教授提交辭呈，理由是這些教授在學問和人格方面不符合帝國大學教授的資格要求。

這7位教授分屬醫科大學、理工科大學、文科大學（當時帝國大學

不設學院而是下設分科大學，即現在的「學部」），他們被要求辭職的消息在這些學科的教授中造成極大震動，但是無人抗議。毫無人事關聯的法科大學卻迅速召開協議會，與會的教授們做出一個決議：教授的任免必須事先經過教授會同意。法科大學負責人根據此項決議，向澤柳校長提出了口頭抗議。

法學教授們為甚麼關心其他學科教授的去留？他們又怎麼敢干涉校長解聘教授？原來，明治維新時代，日本政府效仿德國模式，建立了七所「帝國大學」，京都大學即其一。《帝國大學令》第一條規定，「帝國大學適應國家的需要，以教授學術、技術理論及研究學術、技術的奧秘為目的」。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禮曾對大學校長們說，「諸君在帝國大學裡掌管教務，當遇到為學術還是為國家的爭執時，務必把國家放在優先地位而給予高度重視」。儘管政府要求大學為國家服務，但是自建立之日起，日本的大學就形成了一定的自治傳統，大學教授們將「大學自治」視為當然之事。

例如，作為日本歷史上第一所綜合型大學，東京大學創立初期就形成了教授治學的風氣。日俄戰爭期間，東京大學教授戶水寬人因為堅持主張對俄羅斯持強硬態度，被文部省停職處分。按照關於帝國大學官制的規定，文部大臣在決定帝國大學教授的人事升遷時，首先必須由教授所在大學的校長提出書面申請。但是文部省在作出這個處分之前，並沒有收到校長的書面申請，因此全校教授強烈抗議該處分損害了學術自由和大學的獨立。結果，教授們取得了勝利：文部大臣辭職，校長也因為沒有申請但卻接受了文部省對教授的處理而引咎辭職。這就是著名的「戶水事件」，它確立了大學校長在教授人事權上的書面申請權，該權力保證了大學相對於文部省的獨立性。

不過，日本的「大學自治」並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僅是一個大學管理的習慣制度。與「戶水事件」中東京大學教授們進行的抗議不同，

京都大學法學教授們提出的「教授的任免必須事先經過教授會同意」的要求有些「過分」。因為根據 1886 年頒佈的《帝國大學令》，大學教授任免是屬於政府的權力，大學校長由文部大臣任命，職責是「維持帝國大學的秩序」。從理論上來說，校長作為政府任命的官員，對教授的去留有決定權。或許是考慮到自己是新任校長，澤柳並沒有像以前那樣剛性從事，與教授們直接對立，而是對法學教授們的意見採取了沉默態度。

10 天後，法科大學召開協議會，通過了由全體教授和副教授聯合署名的意見書，闡述了教授任免必須獲得相應學科教授會的同意的理由——

（1）如果校長可以作出對教授的任免決定，則教授地位將失去安定性，從而大學難以獲得優秀的學者。

（2）學術進步必須以學術的獨立性為必要條件。教授必須身處官權的干涉和俗論的壓迫之外。教授會一旦不能介入教授的任免過程，則學術獨立性將無法獲得保障。

（3）對於學者的能力和人品，應該從其學識的優劣和研究用心的深厚的角度進行評判，而對此有能力作出判斷的，只能是作為同事的學者。

（4）校長和教授都是大學的構成機關，彼此之間應該相互合作。然而，當校長以職權的名義對教授作出任免決定時，校長則完全變為政府的代言人而君臨教授之上。

（5）在教授任命方面，從來都遵循着經過教授會推薦這一不成文的規則。即使對於教授免職問題，也同樣應該尊重教授會的意見。

（6）校長專斷地作出決定，會使教授的地位受到輕視，由此對內則影響學生，對外則使社會喪失對學術的敬意。

澤柳校長收到該意見書，沒有表態。但是3天後，他對7位教授的辭職發佈照准免職令。校長的做法在校園中引起軒然大波，教授們紛紛站出來表示反對。為了平息風波，澤柳校長公佈答辯書說，在現行的制度中，並不存在大學教授的任免必須獲得教授會同意的規定。

澤柳校長說，他本人並不非常反對給予教授終身保障的地位，但該項制度建設為時尚早。教授絕不能因其言論違反為政者的主張，或不合潮流而地位受到動搖。但是，因學問、品德和行為方面存在問題從而不具備教授資格時，在世界範圍內還未見有因此原因造成的教授的進退必須經過教授會決定的事例。

校長的說法沒有得到諒解，反而激起了教授們的對抗。1914年1月，法科大學教師聯名提出辭呈表示抗議。法科大學的學生也召開學生大會，表示如教師的主張不被接受，學生將與教師們共進退。此事不僅轟動京都，也在東京引起了反響。東京大學法學部聲援京都大學法科大學。

文部省擔心事態失控，向社會上蔓延。可是文部省沒有無條件支持自己任命的校長，通過使用行政權力來強行解決問題，而是展現誠意，希望通過調解的方式來化解衝突。文部省邀請兩位富有聲望的東京大學教授穗積陳重博士和富井政章博士充當調停人，展開調停工作。

經過兩位博士的調停，1月24日，京都大學教授、京都大學校長和文部大臣之間達成協議。文部大臣承認京都大學法科大學主張的正當性，法科大學教授撤回辭職，進退兩難中的澤柳校長辭職。就這樣，長達半年的「澤柳事件」得到和平解決，京都大學校園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澤柳事件是在大正民主潮流中發生的事件，在日本的大學自治的歷史上具有巨大的意義。澤柳校長辭職後，京都大學校長由東京大學校長兼任，一年後京都大學醫科大學教授荒木寅三郎選任京都大學校長，

之後的校長一律在大學內部由大學自身選舉任用。日本的大學自治制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也有人擔心大學自治將導致教授們保守既得利益，不思進取。可事實上，大學自治是現代大學最為基本的特徵，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學者的尊嚴，促進學術繁榮。例如，歷史學家內藤湖南長期在京都大學任教，是當時頭號的中國問題專家。1928年2月，後來策劃「九一八事變」的軍官石原莞爾問內藤湖南，「從歷史上看，滿蒙是支那（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內藤說：「作為一名日本人，我非常想主張滿蒙是日本的領土，但是學問是不可以歪曲的！」京都大學的教授們堅守這樣嚴謹的學術態度，致力於學術研究，在史學、哲學等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形成了享譽國內外的「京都學派」。

作為京都大學的第五任校長，澤柳政太郎任職僅有一年零四個月。雖然他尷尬退場，卻沒有消沉不振。作為一名民間教育家，他積極參與教育改革，推動自由教育運動，成為日本「實際教育學」的倡導者與新教育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為大正時代的日本實現傳統教育的根本性改變作出了重要貢獻，被稱為「一代宗師，於內是國民教化的最高顧問，於外是日本教育的代表」。

「澤柳事件」不僅成就了日本大學發展史上的一段佳話，也成就了澤柳政太郎。